

从法国社会学到中国马克思主义民族学^{*}

——杨堃先生的治学路径和初心

王希恩

作为中国第一代民族学家,早年的杨堃是法国社会学派在国内的主要传播者,晚年又是国内马克思主义民族学的积极倡导者和建设者。从法国社会学到马克思主义民族学是贯穿杨堃先生一生的学术主线。而支配这条主线的有杨堃先生真诚的学术信仰,也有其贯穿一生的政治初心。新中国成立后,杨堃先生对法国社会学派做出批评或批判的同时,也始终为其留有“借鉴”空间。在艰苦的环境中他一面坚决维护“民族学”和“马克思主义民族学”的名义和地位,一面也用具体研究不断填充着这一学科的内涵。对于杨堃先生来说,马克思主义既是一种学术信仰,也是一种政治信仰,二者缺一不可。为达到这种圆满,他不懈奋斗,历经磨难。这种信念连同他的著述一样珍贵,值得我们永远珍惜和继承。

关键词:杨堃 民族学家 法国社会学 马克思主义

作者王希恩,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特聘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
地址:北京市,邮编 102488。

民族学在中国出现的时间不长。在中国第一代民族学、人类学代表人物中,杨堃先生是最为长寿、离世最晚、学术生命最久的一位。^①他生于1901年,逝于1998年,几与20世纪同龄,堪称世纪学人。杨堃先生1921年赴法国留学10年,受到法国社会学和民族学的系统训练,1931年初回到国内,先后在河北大学、北平师范大学、中法大学、燕京大学、清华大学等从事社会学、民族学、民俗学、原始社会史的教学和研究,发表了大量著述,并参与了中华民族学会的创建,成为中国民族学的开拓者。1947年杨堃先生赴任云南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和教授,为新中国的民族学建设、民族识别和社会历史调查做了大量工作。1979年,在胡耀邦同志的关怀下,杨堃先生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在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拂下焕发了学术青春,成为他学术生涯的另一个高峰。早年的杨堃是法国社会学派在国内的主要传播者,晚年又是国

^{*} 本文写于2021年,以纪念杨堃先生诞辰120周年,曾在“中国社会科学论坛(2021年):现代民族国家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国际会议暨纪念杨堃先生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提交。

^① 后学研究者将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第一代学者中的代表人物”开列了11位,分别为:蔡元培(1886—1940)、李济(1896—1979)、吴泽霖(1898—1990)、潘光旦(1899—1967)、吴文藻(1901—1985)、杨堃(1901—1998)、林惠祥(1901—1958)、杨成志(1902—1991)、凌纯声(1902—1981)、陶云逵(1904—1944)、裴文中(1904—1982)。参见杨圣敏、胡鸿保主编:《中国民族学六十年》(1949—2010),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9页。

内马克思主义民族学的积极倡导者和建设者。从法国社会学到马克思主义民族学是贯穿杨堃先生一生的学术主线。而支配这条主线的有杨堃先生真诚的学术信仰,也有其贯穿一生的政治初心。杨堃先生是20世纪中国民族学最完整的见证人和建设者,其学术思想和治学路程既是他本人特殊经历的写照,也是中国第一代民族学者筚路蓝缕,开创中国民族学之路的侧影,值得再度回顾和阐扬。

一、引进和传播法国社会学派

1921年,20岁的杨堃以甲等第三名的成绩被保定的直隶农业学校留法预备班保送到法国留学,1925年获里昂大学理科硕士学位,1930年获里昂大学文科(社会学)博士学位。期间,在导师的推荐下前往巴黎大学高等学术实习学院及巴黎民族学研究所研修民族学与原始宗教学,并利用暑假去英国、德国、比利时、奥地利、瑞士和荷兰等国旅行,参观了各国著名的民族学博物馆及民俗博物馆。这些经历奠定了他一生的研究方向。杨堃在法国受学于古恒(Maurice Courant, 1865—1935)、莫斯(Marcel Mauss, 1872—1950)和葛兰言(Marcel Granet, 1884—1940)。古恒教授是杨堃的博士导师,也是法国的著名汉学家,直接指导了杨堃的博士论文《关于中国祖先崇拜的问题》,并促成了该文法文版在法国的出版。而莫斯和葛兰言两位教授则是当时法国社会学和民族学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杨堃在巴黎学习时的指导老师。杨堃先生曾叙述过莫斯和葛兰言一系的传承关系:杜尔干(Émile Durkheim, 1858—1917年)是法国现代社会学派的开创者,莫斯不仅是杜尔干的学术继承人,还是该派的代表性作家,或者说是新的法国学派的开创者;而作为莫斯学生的葛兰言不仅是一位“社会学化的中国学家,而且是一位真正的社会学家,第一流的社会学大家,并且是法国社会学派的嫡系与真正的一位代表者”。^① 据此可知,作为莫斯和葛兰言学生的杨堃,自然就是法国社会学派在中国的正宗传承人。

杨堃先生忠实地承担了法国社会学派传承人的角色。他多次谈到,回国以后,“我当时的学术思想是想将我所师从的法国杜尔干社会学派的主要理论与方法介绍给中国,并试图用该派的学术观点与方法研究中国的社会问题、民族问题以及传统文化”。^② 所以自1931年初回到国内到1949年新中国建立,杨堃先生的研究和教学几乎都是围绕法国社会学派的传播和应用展开的。

法国是社会学的发源地。法国人孔德(Auguste Comte, 1798—1857)既是实证主义哲学的鼻祖,也是社会学的开创者。但继承孔德社会学的不是他的实证主义信徒,而是同为法国人的杜尔干。杜尔干的代表作有《自杀论》及《社会分工论》等。1896年杜尔干创建了法国《社会学年鉴》,围绕这一刊物形成了以他为核心的“法国社会学年鉴学派”。由于该派观点成为当时法国社会学的主流,代表了法国社会学的主要成就,故常直接称以“法国社会学派”。

在杨堃先生之前,同赴法留学的许德珩曾翻译出版过杜尔干的《社会学方法论》,崔载阳翻译出版过杜尔干的《道德教育论》,已经使法国社会学派在国内有所传播。1932年初回国后的

^① 杨堃:《葛兰言研究导论》,杨堃:《社会学与民俗学》,四川民族出版社1997年版,第115页。

^② 杨堃:《自序》,杨堃:《杨堃民族研究文集》,民族出版社1991年版,第3页。

杨堃发表《中国现代社会学之派别及趋势》一文,^①谈及法国社会学派在中国的影响不够而深感内疚,认为其责任完全“在法国学社会学的同学们,未能组织起来作一种系统的介绍”。这种责任感,成为杨堃奋力传播法国社会学派的一大动因。

杨堃介绍法国社会学派的第一大成果是翻译出版了狄亚(Déat Marcel)教授的《法国现代社会学》。狄亚是法国杜尔干学派的后起之秀,这本书和他与别人所著的《社会学学术指南》是当时法国社会学界极为流行的两本书,也是各大学社会学重要的参考书之一,“大凡在法国学社会学的,没有不知道这两本书的”。^②随后杨堃又发表了《介绍雷布儒的社会学学说》(1932年)、《社会形态学是什么》(1934年)、《莫斯教授的社会学学说与方法论》(1938年)、《葛兰言研究导论》(1943年)、《孔德社会学研究导论》(1944—1945年)等一系列论文,^③这些论文多为大部头,动辄几万字,资料丰富、说理透彻,通过对法国社会学派代表人物学说的介绍系统传达了该派的主要理论、方法和意义,同时,也在传达中提取精要,形成了自己的观点。比如他在研究了孔德等人的理论后认为,“社会学确是一门科学,但是一门很幼稚的科学。它的对象是研究人类社会之组织及演进的”。社会学从神学和哲学的束缚中脱离出来后,依次经历了“生物派”和“心理学派”,而发展方向应是“科学的社会学”。社会是一种“有关系”的人共同生活的结果。但人群的结合,无论是偶然的还是定期的,一时的还是永久的,总要服从某些规律,遵循某些习惯或法律,即“权力”(autorite),所以,“一个社会可说是服从同一权力的一群人,或说是有共同习俗的一群人,这即是社会的定义”。^④现在看来,仍然不失精辟。

民族学和社会学从一开始就有着密不可分的渊源关系。根据杨堃先生的研究,“民族学”(ethnologie)一词是1829年由法国博物学家爱德华(Edwards,1777—1842)最先提出的,民族学第一个学术组织巴黎民族学会是1839年在法国成立的,最早的民族学博物馆也是于1878年在巴黎创立的。所以,法国是民族学的发源地。与此同时,孔德的社会学体系“完全是以民族学为基础的”,^⑤他的社会动力学和社会静力学理论及对自然科学的引入都成为民族学的先导性理论。杜尔干继承了孔德,“因此他的社会学是包括民族学在内的一种综合性社会科学”。“至于莫斯,他本人就是民族学专家兼社会学家,他的许多见解与杜尔干是相同的。他认为民族学、史前学、民俗学、历史学都不是独立的科学,而是社会学的一部分,为社会学提供资料”。^⑥因此,法国社会学派本身就有着浓郁的民族学色彩,而杨堃从1928年至1930年底回国前一直就在巴黎的民族学专门研究机构跟从莫斯和葛兰言研修民族学,这不能不使杨堃的学术背景,即便是社会学,也大有民族学的内涵。也因此,杨堃对法国社会学派的介绍主要着眼的是民族学。

杨堃对法国民族学的专门介绍以发表于1936和1937年的《法国民族学之过去与现在》和《法国民族学运动之新发展》^⑦为代表。两篇文章介绍了法国在西方民族学创立中的突出作

① 原文刊于《鞭策周刊》第1卷第3、4期,1932年3月。

② 杨堃:《〈法国现代社会学〉译者序》,杨堃:《杨堃民族研究文集》,第3页。

③ 这些文章在《杨堃民族研究文集》书后的“著译目录”中有具体出处。

④ 杨堃:《社会学与民俗学》,第1—6页。

⑤ 杨堃:《法国民族学之过去与现在》,《民族学研究集刊》第1期,1936年。

⑥ 杨堃、张雪慧:《法国社会学派民族学史略》,《民族研究》1981年第4期。

⑦ 杨堃:《法国民族学之过去与现在》,《民族学研究集刊》第1期,1936年;杨堃:《法国民族学运动之新发展》,《中法大学月刊》10卷5期,1937年。

用,讲了人类学和社会学在其中的贡献、法国民族学者的成就,特别介绍了巴黎民族学学院,包括该学院的沿革、归属、机构设置、课程,研究内容以及代表性人物等,认为这个学院是法国现代民族学研究和民族学家最集中的机构,代表着法国民族学的发展现状,形成了法国现代民族学唯一的学派,即“法国民族学派”。它汲取法国人类学派和社会学派的精华于一身,兼取英、美、德、奥诸学派之所长,既与现有的一切学派均不相同,又代表了法国的传统思想。^① 这些介绍,既宏大,也细致入微,叙事叙人如数家珍,在同类研究中堪称佳品。

由于法国民族学与社会学的密切关系,晚年的杨堃有将其合而为一的倾向,曾与他人合作写了《法国社会学派民族学史略》一文。这篇文章不同于他三四十年代观点的地方在于,更突出了法国社会学派对民族学的贡献以及它的民族学特征。他在文中认为,民族学发源于法国,有着光荣而悠久的历史,但与法国社会学派结合,在理论上开始有自己的观点方法,在组织上有初具规模的阵容,则是以十九世纪末杜尔干创立《社会学年鉴》,形成社会学年鉴派为标志。杜尔干利用民族学资料发展了社会学,而他的外甥莫斯则继承了他的观点,^②成为其学派民族学的主要继承人。杨堃先生极为推崇他的老师莫斯,称他的学问“渊博而精细”,“莫斯乃是一个天赋极高的聪明人。他简直可说是一个‘明眼人’。他的思想之细密与深入,以及他的判断力之丰富与锐敏,实均出人意料之外”。^③正是莫斯,成为法国社会学派民族学的实际开创者。杨堃概括了法国社会学派的两个传统,一是把民族学与人类学视为两门并列的姊妹学科,而社会学是包括民族学在内的一种综合性学科;二是偏重理论研究,杜尔干本人没有做过任何民族学调查,而且一再主张把社会学搞成一种纯理论的学科,不必与实践应用相关。莫斯也没有亲自做过民族学考察。这虽是个传统,却是个致命的缺陷,因为民族学最终是靠田野调查作为依存条件的。所以到20世纪40年代中期之后,法国社会学派的这一传统就被经验主义所取代,走向田野了。当然,这已不能挽救法国社会学派的衰败。

杨堃对包括民族学在内的法国社会学派在学术发展史上的地位做了充分概括,认为以杜尔干、莫斯为首的法国社会学派形成稍晚于进化学派和传播学派,但杜尔干的功能理论和比较社会学的方法影响了英国功能派,尤其是拉德克利夫-布朗(Radcliffe-Brown, 1881—1955)的结构功能学说,而莫斯的关于互相交换的原则也为列维-斯特劳斯(Lévi-Strauss, 1908—2009)提供了考察原始分类制度的出发点。他也认可这一观点“实际上现代人类学的基础是杜尔干和他的法国社会学派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确立的”。^④这是很高的评价,但同时也说“在实践上,法国社会学派民族学同样是为殖民主义政策服务的”。^⑤

在介绍法国社会学派民族学的同时,杨堃也做过一些民族学具体研究,比如1934年发表的《民族学与社会学》一文就结合国内的实际,对民族学和社会学的一些基本问题表达了自己的观点。^⑥但总的来说,1949年之前杨堃先生纯粹的“民族研究”不多,而是散布在可以纳入“社会学”之内的广泛领域。1997年受杨堃先生委托,他的学生周星教授为其编辑出版了《社会学与民俗学》一书,主要辑录了他1949年以前的文章。在完成选编之后的后记中,周星“摘

① 杨堃:《杨堃民族研究文集》,第93页。

② 包括杨堃先生在内,中外一些研究者曾把莫斯说成是杜尔干的女婿。但后来杨堃经过了解,知道莫斯是杜尔干的外甥而非女婿,此后做了纠正。参见杨堃:《法国民族学运动之新发展》,《中法大学月刊》10卷5期,1937年。

③ 杨堃:《莫斯教授的社会学学说与方法论》,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学界》第10卷,1938年6月。

④⑤ 杨堃、张雪慧:《法国社会学派民族学史略》,《民族研究》1981年第4期。

⑥ 杨堃:《民族学与社会学》,《社会学刊》4卷3期,1934年。

其要者”列出了一些未被收入的著述,包括《社会学文存》三册(内收1929—1938年的32篇论文),法国里昂鲍思克兄弟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家族中的祖先崇拜》(杨堃的博士论文,法文原文)、《在法国怎样学社会学》《初民社会之家族与婚姻》《编纂〈野蛮社会史〉之商榷》《家族演化之理论》《中国儿童生活之民俗学研究》(与张若名合著,法文)、《法国社会学家莫斯教授书目提要》《社会科学讲话》《勒普来学派社会学研究导论》《评中国古代社会新研初稿》,译著《法国现代社会学》([法]狄亚著),以及讲义《社会进化史》《社会科学概论》《人类学大纲》等。^①从中可以看出杨堃先生研究领域之广、成果之丰,但还是以社会学、民俗学、民族学和原始社会史为范围,而这正是法国社会学派的风格。因为杨先生认为,法国社会学派理念中的“社会学”等同于“社会科学”,各学科之间的界限不是很清楚。

按狭义的学科划分,杨堃的起步是民俗学,其博士论文的题目《中国家族中的祖先崇拜》已说明了这一点。尔后的研究一方面着力于民俗学的学科建设,对民俗学涉及的基本问题、民俗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以及中国民俗学的发展沿革等做了阐述,一方面又运用民俗学理论对中国的一些民俗做了深入探讨,其代表性作品就是中国民间“五祀”的研究。关于“五祀”的涵义历史上多有歧义,而杨堃通过考证确认为“户、灶、中溜、门、行”五种祭祀。据此他既写了《五祀考通论》,又写了《灶神考》和《中溜神考》,分别对中国民间的这些祭祀内容、演变和意义做了详尽考证,内中引证了大量的古代文献、民间传说和考古资料,也贯穿了沙畹(*Edouard Chavannes*, 1865—1918)、马伯乐(*Henri Maspero*, 1883—1945)和葛兰西等法国社会学派的分析方法,杨堃的古代文献考辨能力、民俗理论和实践的贯通能力在此得到了充分展现。

20世纪20—40年代是中国民族学形成和发展的初期,第一代民族学家几乎都有着留学西方,接受国外民族学不同学派和理论训练的经历,也由此形成了国内不同学术流派的分化和传承的发展格局。这其中,留法学者是一支十分重要的力量,除了杨堃之外,像许德珩、杨成志、凌纯声、徐益裳、卫惠林等也都是著名的民族学家和社会学家,与留学英、美、德等国的学者相比并不逊色。然而他们并没有形成一个可见的法国流派。因此杨堃先生对法国社会学派的执着传播和信守就显得尤为可贵。“杨堃的学术努力使得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社会学、民族学、民俗学、历史学以及人类学这些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具有了多样化的理论倾向”。^②

法国社会学派的窘况与其过于浓重的理性主义色彩有关。正如前述,不论是杜尔干还是莫斯都主张把社会学和民族学搞成一种纯理论的学科,不必与实践应用相结合,他们自己也没有做过田野调查。这种理论和理念当然也会影响到它的信从者。

当然,“社会学中国化”的口号自20世纪20年代后期就在中国学界提出了。在杨堃先生大力传播法国社会学派的同时,以吴文藻、李安宅、费孝通、林耀华为代表的一些学者接受了拉德克利夫—布朗和马林诺夫斯基(*Malinowski*, 1884—1942)的学说,形成了“中国功能学派”。他们努力将西方研究原始民族的理论和方法应用到当代社会,注重实际运用,成为后来中国民族学界普遍推重的学术方向。^③即便如此,旧中国的社会学和民族学发展整体上是有着很大局限性的。1949年6月16日,已被中国人民解放军接管的燕京大学举办了一个由在北平著名社会学家和民族学家参加的座谈会,其会议记录写道:“中国社会学系由英、美介绍移植而

① 周星:《校读后记》,杨堃:《社会学与民俗学》,第474页。

② 岳永逸:《“学术同工”杨堃的批评》,《读书》2018年第6期。

③ 王建民:《中国民族学史》上卷,云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46—147页。

来,因沿袭英、美改良主义的社会学学说,具有保守倾向,因着重实际、接近群众,带有进步趋向。社会学者具有综合的观点,并能接近民众,因此在研究社会现象上,比较旧社会下其他部门的社会学者观察为深刻。社会学者提倡社会调查、实地研究,在学术界中倡导实事求是看重实际的作风,并在介绍多种研究方法、技术(如统计法、历史法、个案法、人类学法等)上都略有贡献。但由于客观环境限制,一受反动政权的压迫,二受社会学者本身阶级出身的影响,社会学者不敢反抗旧统治者,以小资产阶级立场研究中国社会。研究结果既不为劳动大众服务,亦未为统治者所重视,虽有求‘客观’之名,但尽‘逃避现实’或‘直接间接为统治者培养人才’之实,以至数十年来社会学未能担当发挥其应有之职能,对于中国社会之实际的贡献甚少。”^①这些评价和反思十分深刻,切中时弊。说中国社会学沿袭英美是一种概说,法国、德国等也应在内。所以,沿袭英美的社会学如此,沿袭法国的社会学焉能不如此;其他社会学者如此,杨堃先生当然也难以超脱。他自己也承认,二十年代在法国留学,学习的是资产阶级民族学,回国后从事教学和研究,也完全是照搬外国的一套。

杨堃先生生性耿直,忠于学术痴情不移,以至于显得“不谙世事”“不近人情”。1932年3月回国伊始他即发表文章,指点中国现代社会学现状,说目前“社会学在中国,幼稚得可怜”,恐怕仅有三派:一为美国文化学派,二为马克思主义派,三为法国社会学派。而在介绍前两派的领袖及著作时则多为批评且用语激烈。如说孙本文在介绍美国的文化学派时,对于法国社会学派的观点一字不提,“孙先生的眼光仅看到美国而不知其他,以一代全,殊为憾事!”说李达先生很有学问,著述颇多,“不愧是一位有名的作家”,但他的《现代社会学》一书印刷错误极多,译名也欠妥,书中观点也多有不当,指责李达这本书并未提及现代社会学界最有权威的学说,“似有点对不起‘现代’二字”。^②杨堃先生的这种率真态度和批评当时并没有引起多大矛盾,甚至可以被认为是得到理解的。因为他批评过的孙本文和吴文藻都曾在后来帮助过他:1937年杨堃到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任教是吴文藻介绍的,1947年到云南大学任社会学系主任又是孙本文推荐的。然而他的这种性格带来的并不都是正面的回应,尤其是在后来的岁月。1983年出版的《民族与民族学》一书是杨堃先生具有代表性的论文集,而这些论文几乎每篇都引起过“争论”。“这些争论,有的是批评,有的是斗争,也有讽刺”,但杨堃始终“坚持己见,没有见风使舵,从不拿原则做交易”。致使一些文章当初发表时编辑不敢采用。^③后人评价说,“因为对学术的忠诚与坚守,跨界的杨堃生前也大抵是孤寂的,至少显得‘不合群’抑或说‘不合时宜’”。“对于中国社会科学界这个‘江湖’而言,一本正经呐喊的杨堃,常常如‘持戟独彷徨’的无门无派的斗士”。^④这个评价甚是形象而恰当。

二、倡导和建设马克思主义民族学

应该说,杨堃在北平期间的民族学研究是不完整的,因为北平不具备民族学调查的充分条件。1947年杨堃先生携夫人张若名接受云南大学熊庆来校长邀请,南下昆明就任云南大学社

① 转引自杨圣敏、胡鸿保主编:《中国民族学六十年》(1949—2010),第26页。

② 杨堃:《中国现代社会学之派别及趋势》,《鞭策周刊》第1卷第3、4期,1932年3月。

③ 杨堃:《民族与民族学》,四川民族出版社1983年版,“自序”第2页。

④ 岳永逸:《“学术同工”杨堃的批评》,《读书》2018年第6期。

社会学系教授及系主任。云南大学社会学系1938年由吴文藻先生创办,之后又先后易手陶云逵和费孝通教授,目标是发展云南的民族学和人类学,^①这与杨堃的愿望是一致的,也为杨堃的民族学研究打开了新天地。他满腔热情把社会学系当做民族学系来办,建立工作站,带领学生搞调研。至1949年11月云南解放之前,杨堃以在昆明附近少数民族聚居的玉案乡调研为基础,结合其他材料写出了《云南农村》一文。这篇调查报告涉及云南农村的分类、农民的分类、耕地的分类、租佃制度、宗教生活、政治组织等,可谓云南农村社会的一个缩影。其中也有大量的民族状况描述,如讲“平原区几为汉人活动地盘,丘陵区乃汉夷杂处之处所,山区则又几全属夷人生活之范围”。土司的辖区也分夷、汉两种村落,并不杂处,“故土司治下的地方官吏又可分为管夷与管汉二种”。^②1954年,杨堃参加了云南彝族地区的民族识别;1956年全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开始以后,参加了西盟佤族的调查,担任调查组组长。其后,1958年至1966年春天,杨堃先生又先后参加了云南省德宏傣族、楚雄和四川大凉山彝族以及云南个旧哈尼族的社会历史调查。他在65岁高龄的时候还冒着生命危险,跋山涉水亲临调研现场。^③通过调研和理论的结合,他培养了一批少数民族学生和学术骨干,写出了调研报告,发表了研究成果,在实践中逐步完成了由信从西方民族学到接受马克思主义民族学的转变,为新中国的民族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

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学最早的代表作,以这本著作的传入和基本观点做出的人类早期社会研究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民族学出现的标志。但马克思主义民族学成为中国民族学的主流和主体则是随新中国的成立发端的。从20世纪50年代初的院校调整和学科调整开始,远在西南的杨堃先生便和其他各地的民族学家一起,积极投身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民族学建设。他在云南大学开设了原始社会史课程,并于1955年3月将《原始社会史讲义及民族志初稿》油印成册。讲义最初是按照苏联高等教育部的教学大纲编写的,旨在应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和社会经济形态学说阐述原始社会发展的一般历史。该稿在使用过程中不断修改,至1986年以《原始社会发展史》为名正式出版,这可以看作是杨堃先生奉献给马克思主义民族学的第一份成果。

经过学科调整的中国民族学尽管没有被取缔,但学科地位并不巩固,以至于集中了全国顶尖民族学家的中央民族学院都没有明确的“民族学”研究机构,虽有民族学专业却并不招本科生。^④而杨堃则始终坚持民族学的学科地位,坚持民族学的正确发展方向。

1957年杨堃先生发表了《什么是民族学》一文,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阐述了民族学的一些基本问题。他特别强调“民族学乃是一门历史科学,但它和其他历史科学的分别,是在于主要地要用直接观察的方法,去研究世界上各民族的特殊的发展规律”。他力主“民族学”这一学科名称的合理性,对当时存在的“人种学”“人文学”“民俗学”和“民志学”等名称一一做了否定,也区别了“资产阶级民族学”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民族学”的不同。说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民族学具有明显的阶级性和党性,是替社会主义建设和全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与民族解放运动服务的,而资产阶级民族学在本质上,是替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服务的。民族学不仅是一门历史科

① 杨堃:《杨堃民族研究文集》,第240页。

② 杨堃:《社会学与民俗学》,第273、292页。

③ 杨堃:《杨堃自叙》,《史学理论研究》1998年第4期。

④ 王建民、张海洋、胡鸿保:《中国民族学史》下卷,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74页。

学,而且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社会经济形态学说的一种具体的应用。杨堃在文中明确表示他的一些观点来自斯大林的理论,也和一些苏联学者的观点相同,但并非唯苏联理论是从。比如在几个重要问题上他就直接提出向切博克沙罗夫(Н. Н. Чебоксаров)商榷。而切博克沙罗夫教授正是来华指导中国民族学的头号苏联专家,时任中央民族学院院长顾问。^①《什么是民族学》为巩固中国民族学的学科地位有着积极的建设性意义,也奠定了他后来明确倡导的马克思主义民族学的基本观点。但第二年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民族科学研讨会上,他的观点作为右派言论受到严厉批判。

20世纪50年代末及其后,随着中苏关系破裂,苏联民族学乃至全部的“民族学”都遭到否定,而一直高举民族学大旗的杨堃也备受责难。1964年有人针对杨堃发表文章讲,不管是西方的民族学、苏联的民族学还是旧中国的民族学,“实际上讲,都是资产阶级的民族学”,而资产阶级民族学不能说是一门科学,“不仅资产阶级民族学不是科学,就是资产阶级的所有社会科学,也谈不上是科学”。“旧中国的民族学(不管是哪一个学派),在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应该说,是没有继承存在的余地的。对我们来说,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民族问题学说,它是研究一切民族问题的最根本、最完备的科学。因此,我们认为,没有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民族问题学说之外,另搞一个什么‘马克思主义民族学’的必要”。^②

作者在此不但否定了“民族学”和“资产阶级民族学”,也否定了“马克思主义民族学”,同时提出了用马克思主义“民族问题学说”来取代或涵盖“民族学”的问题。杨堃先生随即发表了《对资产阶级民族学的批判与继承问题》一文予以全面反驳。杨堃认为,关于民族学是否存在和是否为一门科学的问题,取决于民族学有没有自己特殊的研究对象,而“这是不成问题的”。“民族学是一门活的历史科学,是主要用直接观察和调查的方法研究世界各民族发展规律的活的历史科学”。“马克思主义民族学,便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去调查研究民族学资料而获得科学成果之总和,严格地讲,仅有马克思主义民族学才是唯一科学的民族学”。杨堃也对苏联民族学做了评价,“苏联民族学尽管走了不少弯路,但在指导思想仍然遵循了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在学术研究领域也取得了伟大成就。他们的经验教训对于我们今天建设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民族学,无疑具有借鉴作用”。而对于资产阶级民族学也同样应持批判和继承的态度。在这些问题的阐述中,杨堃先生应用了大量经典作家的论述和国内外民族学资料,显示了深厚的民族学专业素养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

关于马克思主义民族学和马克思主义民族问题学说的关系,杨堃认为,“这是两个不同的科学概念,两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不能混为一谈”。“关于民族问题的学说,乃是一种政治学说和革命学说,在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之内,它应属于科学的共产主义理论的范围之内。而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学,则是一门活的历史科学,它研究世界各民族的发展规律,当然也包括民族革命的发展规律在内。然而在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之内,都没有它的份儿”。^③ 杨堃先生这里所谈的“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学说”在当今被称为“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或简称“民族理论”,属于国家学科划分中的民族学一级学科之下的二级学科,与所谓的“小民族学(文化人类学、社会人类学)”仍然为并列关系,但两者的原有联系和区

① 王建民、张海洋、胡鸿保:《中国民族学史》下卷,第98页。

② 史进:《对“民族学”的质疑——向杨堃先生请教》,《学术研究》(云南)1964年第2期。

③ 杨堃:《民族与民族学》,第157—176页。

别恐怕鲜有比杨堃先生的论述更为清晰的了。

这一时期,杨堃先生一方面维护着“民族学”和“马克思主义民族学”的名义和地位,一方面也在用自己的具体研究填充着这一学科的内涵。主要围绕的是两个大的问题:一是关于民族的历史类型和译名的讨论,二是关于原始社会的分期问题。

关于第一个问题,杨堃先生主张,中文中的“民族”可分“广义的民族”和“狭义的民族”。前者又可指“民族共同体”,如所谓原始民族、蒙昧民族、野蛮民族、狩猎民族、游牧民族、前资本主义民族、古代民族和现代民族等,在国际语言中常表达为源自希腊文的 *ethnos*。然若从现代民族学的角度来看,广义的民族仅能包括代表四种类型和四个不同发展阶段的民族,那便是氏族、部落、部族和民族。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一文内所定义的是“狭义的民族”,包括资本主义民族和社会主义民族,也是民族共同体的最高类型。与此相联系,他认为“部族”很好地表达了俄文中 *народность* 一词,是民族共同体系列中对应于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民族类型。^①

对于第二个问题,杨堃先生认为,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原始社会史可以分为三个时期:1. 形成期,即“正在形成中的人”或“人类的童年”,属原始群时代;2. 发展期,即完全形成的人,亦即母系氏族公社时代;3. 解体期,即一般所说的父系氏族公社时代,亦即部落社会时代。三个时期又各分为初、中、晚三期,分别对应于考古学和社会发展史上的不同阶段。^②

与杨堃先生的观点不同,牙含章等学者主张,氏族和部落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结成的,民族则是在地缘关系的基础上形成的。氏族、部落和民族有本质的区别。因此,根据恩格斯“由部落发展成民族和国家”的论述,民族是在部落之后形成的以地缘为基础的共同体,不存在“广义”和“狭义”的民族和氏族、部落、部族、民族这样一个历史系列。俄文中的 *народность* 一词,也不应译为“部族”,而应译为“资本主义以前的民族”。原始社会当分为蒙昧时代和野蛮时代,氏族部落形成于蒙昧时代的中级阶段,蒙昧民族形成于高级阶段,而野蛮民族则存在于野蛮时代的全部阶段,进入文明时代以后,野蛮民族便发展为文明民族等。^③

这些问题的讨论都是1954年以来学界关于民族形成问题“大论战”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民族学和历史学发展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而杨先生的观点即属于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观点之一。这场论战至60年代形成高潮,文化大革命中断十年后又在80年代得到了延续。时至今日,除了话语的时代痕迹之外,讨论中形成的各种观点和理论还深刻地影响着我国的民族研究领域,而老一辈学者们深厚的学术功力和执着精神也每每为后学所仰慕。

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是中国文化的大劫难。和其他民族学家一样,杨堃先生被抄家批斗、关牛棚。他的图书资料,包括几万张读书卡片和手抄稿大半遗失了,为他的民族学研究造成了无法挽回的损失,中国的民族学也作为“资产阶级学科”而被再次打入冷宫。

改革开放迎来了科学的春天,民族学也获得了新生。1980年10月,在第一届全国民族学研讨会上,当选第一任民族学学会会长的秋浦先生讲,民族学从20年代传入中国后,前后可分两个阶段,前一阶段,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前,主要是传播西方的民族学,当时西方流行的一些资产阶级民族学派都被先后介绍到中国来了。后一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代之而

① 杨堃:《关于民族和民族共同体的几个问题》,《学术研究》(云南)1964年第1期。

② 杨堃:《试论原始社会的分期问题》,《学术月刊》1964年第4期。

③ 郑信哲选编:《牙含章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46—56页。

来的是苏联的民族学。我们现在所需要的民族学,不是这一种或那一种的翻版,“而是发展适合我们需要的并有自己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学。我们应当探索出一条发展我国马克思主义民族学的道路”。^①

这个倡议得到了会议的一致响应,发展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学也成为民族学界的广泛共识。从云南大学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的杨堃先生也意气风发,更为自觉地投入马克思主义民族学的研究之中。从1978年直到去世,杨堃先生发表了数十篇论文,出版了6本著作。这些著作依次是《民族与民族学》(四川民族出版社1983年版)、《民族学概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原始社会发展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杨堃民族研究文集》(民族出版社1991年版)、《民族学调查方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社会学与民俗学》(四川民族出版社1997年版)。这些论文和著作构成了他人生的第二个学术高峰,也是他全部学术思想的集中体现。其中《民族学概论》可以看作是他对民族学,也是对马克思主义民族学的一种系统构建。

杨堃先生的《民族学概论》共分三编。第一编“导论”,分别阐述了民族学的定义,民族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的关系及在其中的地位。第二编“民族学发展史略”,分五章介绍了民族学的起源到当前的状况,包括各学派的简史和马克思主义民族学的发展。第三编“民族学的基本知识”是全书的核心,共分六章。通览全书可明显感到有两个明显特点:一是历史唯物论色彩浓郁,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民族学的鲜明属性。二是研究范围主要集中在人类社会的早期历史,带有明显的传统民族学痕迹。

杨堃首先定义“民族学是研究民族的科学”,而这里所说的民族是广义的,指民族学一词的词根 *ethnos* 所能涵盖的各种共同体,包括氏族、部落、部族和民族(资产阶级民族和社会主义民族)。“民族学应研究民族的发展规律,即研究各个民族的来源、发展过程、地理分布、民族接触和文化交流、生活方式等民族特点和发展规律”。^② 民族的发展过程和规律与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相对应,因此民族学的内容就具化为人类社会史史的各个发展方面,即技术发展史、财产发展史、家族婚姻史和精神文化的发展史等,这在书中就呈现为第三编的各章。民族学是一门历史科学。这是杨堃先生始终坚持的一个观点,也是他体现自己唯物史观的一个重要方面,因此除了研究内容全面贯彻“史”的理念之外,他又用全书一半的篇幅,即第二编阐述了“民族学发展史略”。这个“史略”以“马克思主义民族学”和与之有渊源关系的摩尔根的学说为轴心依次安排了五章,就是围绕“马克思主义民族学”的产生和发展而设定的。

第三编“民族学基本知识”,从小标题来看几乎涵盖全部的人类历史,但具体内容的叙述则主要集中在人类历史的前期,尤其以“史前”阶段的人类生活为多,包括各种“起源”“形成”“历史类型”等均以叙述人类早期历史为主。一般来说,早期民族学就是对“落后民族”的研究起步的,而杨堃先生的早期人类历史叙述同样取材于“落后民族”的材料,但目的则是论证唯物史观,服务于马克思主义民族学的建构。当然,这样的安排也是和杨堃先生原有的研究一脉相承的,也合拍于中国民族学发展的普遍状况。

杨堃先生说:“我坚信在资产阶级民族学之外,还应有马克思主义民族学。只有在社会主义国家,才有发展马克思主义民族学的物质基础。在十年动乱期间,我也没有放弃这一信念。

① 中国民族学研究会编:《民族学研究》第一辑,民族出版社1981年版,第4页。

② 杨堃:《民族学概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5页。

自1955年以来,我便以如何建设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民族学与民俗学,作为自己的终身事业与奋斗目标。”^①作为中国第一代民族学家,杨堃先生既是我国民族学的拓荒者,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民族学的拓荒者。所谓“拓荒”就是前面没有路,于是向别人学习,走一段别人走的路是一个正常过程。30—40年代学习法国社会学派,50—60年代学习苏维埃学派,都是这样一个过程。苛求杨堃先生的局限性没有意义,因为这是时代使然,民族学乃至全部社会科学的发展规律使然。必须承认,近代中国的社会科学,包括今天习见的概念、术语、定律乃至学科体系等几乎都可溯源于国外,马克思主义主要传自苏联。可谁能说这些东西都是错误的,苏联的东西都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呢?杨堃生前多次讲,“马克思主义民族学是在资产阶级民族学的基础上产生的一门新的社会科学。它的历史更短,还在草创时期。它的许多概念和理论远未取得一致的公认”。^②但作为一种“尝试”,杨堃先生还是在研究实践中构建了自己的马克思主义民族学体系,其贡献已难能可贵了。

1983年3月杨堃先生曾应邀为岑家梧教授的《中国原始社会史稿》一书作序,他在充分肯定了该书的优点之后说,“这是著者在1958年所写的一部遗著。从1958年至现在,我国考古学界、民族学界和史学界又出现了许多新资料和新理论,这就使1958年以前的论著会有些过时的地方,读者当会谅解”。历史地看待一种学说和人物,是杨先生生前秉持的一种观点和方法,也是我们当今看待他的学说应有的观点和方法。

三、贯穿始终的学术内因和政治初心

新中国成立后,老一辈民族学家普遍从西方民族学转向了马克思主义民族学,而杨堃先生的这一转变还有其特殊的学术内因和政治背景。

杨堃先生对法国社会学派的信奉是深入骨髓的。他在评价这一学派时认为,在民族学的发展史上,进化论学派与传播学派是较早形成的两个阵营。而在二者的对垒中,社会学派基本上是和摩尔根的进化论派同一阵线的。“社会学派注意研究社会的物质结构,重视人口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这是应予肯定的。……但如果说在西方民族学界,社会学派作为进化论派的一支,在某些具体研究中较其他学派接近历史唯物论,也未始不可”。^③以此,由于进化论派接近历史唯物论,与摩尔根的学说属于同一阵营,所以也接近马克思主义民族学。

杨堃先生曾讲,他在解放前写的东西基本上是法国社会学派的,并企图将其中国化,与他在解放后的研究还是有一定连贯性,只是解放后转变了立场,采用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西方资产阶级的学术观点还是有继承性的,法国社会学派是值得马克思主义民族学参考的。^④正因为这样,他可以将法国社会学派置于“资产阶级社会学和民族学”的范畴做出“批评”或“批判”,但始终要为其留出积极和正面的“借鉴”空间,即便在文化大革命的极端岁月依然如此。他说,当时有人“让我做一次讲演,介绍法国社会学界莫斯教授,本意是想让我借此批判莫斯教授,和他划清界限,但是,我的讲演说莫斯教授不是一个反动教授,虽然他不

① 杨堃:《杨堃民族研究文集》,第519页。

② 杨堃:《民族学概论》,“前言”。

③ 杨堃、张雪慧:《法国社会学派民族学史略》,《民族研究》1981年第4期。

④ 杨堃:《杨堃自叙》,《史学理论研究》1998年第4期。

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他是一个社会党员,还是一个法国爱国主义者,而且同情中国人,他的社会学理论、方法,民族学理论、方法,特别是关于原始宗教的思想对于我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原始宗教学、社会学都是有参考价值的,都是有帮助的。莫斯不是打击的对象,而是团结、统战的对象”。这些话让在场师生大为吃惊。^①

其实对于从民国时代过来的大多数民族学家来说,马克思主义学说并不陌生。1932年杨堃先生在评价中国社会学时就把“马克思主义派”作为三个主要派别之一,并说现代中国的社会科学“在实际上,总有十分之七八,全是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品。现在学理科的学生亦需要懂一点马克思主义。即遇一中学生而谈社会学,他亦要问你是什么立场,大有不懂唯物辩证法便不配来讲社会学之势”。^②所以,当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引导社会科学为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时,民族学家们转向马克思主义并不困难,对杨堃先生来说更是如此。于此也可以理解,无论是与不同观点的“论战”还是自陈新见,在马克思主义观点和著述的应用上杨堃先生总是那么纯熟。

杨堃先生曾是有着强烈政治热情的青年。还在中学阶段他就参加了家乡河北大名县的“五四运动”,和其他学生一起上街游行、抵制日货、提倡国货、宣传爱国主义。1921年杨堃以优异成绩被保送到法国里昂中法大学留学,成为中国留法勤工俭学学生的一员。留法勤工俭学是五四运动的产物,由蔡元培、李石曾和吴玉章等发起。留法勤工俭学学生中的很多人是参加过五四运动的。“他们想找救国之道,想找出路,于是就到法国去寻求。但开始去并不都是为了找马克思主义,多数是从爱国思想出发的”。^③杨堃正是如此。受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影响,年轻的杨堃广涉“新学”,以为学习西方才是救国救民的唯一途径,“而在西方国家中,法国的大革命最彻底,所以觉得法国是最民主最先进的国家。因而,我渴望着到法国去学习”。^④

杨堃在法国先结识了他的同乡,也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女活动家郭隆真。1923年上半年经郭隆真介绍加入了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下半年又加入了国共合作的国民党。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原称“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成立于1922年6月,领导人是赵世炎和周恩来。1923年6月党的“三大”决定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后,旅欧共青团全部80多名团员也以个人名义加入了国民党。^⑤而杨堃则担任了国民党里昂支部的代表和国民党旅欧总支部宣传委员。这期间杨堃认识了同在法国的周恩来、蔡和森、陈毅和邓小平等,在他们的领导下,为团结争取华工、宣传中国革命,揭露和抨击北洋军阀政府,号召华侨和国际友人支持中国北伐战争做了大量工作。为表示革命,杨堃一度将自己的名字改为“杨赤民”。

也是经郭隆真的介绍,杨堃认识了后来成为他妻子的张若名。张若名生于1902年河北清苑县,1916年考入“直隶北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与邓颖超是同级同学,也是五四运动期间天津学生和妇女界的领袖之一。1920年1月张若名和周恩来等遭反动当局拘捕,当年11月出狱后同赴法国勤工俭学。1922年张若名在法国加入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并被选为中央执行

① 杨堃:《杨堃自叙》,《史学理论研究》1998年第4期。

② 杨堃:《中国现代社会学之派别及趋势》,《鞭策周刊》第1卷第3期,1932年3月。

③ 《李维汉同志谈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政协河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河北文史资料选辑》第17辑,河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6页。

④ 杨堃:《民族与民族学》,第391页。

⑤ 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90页。

委员。^①五四前后和留法期间张若名撰写了一系列妇女解放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在中国妇女运动史和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都具有重要影响。^②所以,张若名的政治身份和经历是影响杨堃政治立场的重要因素,也是杨堃政治履历的一部分。

遗憾的是杨堃和张若名却在严酷斗争中脱离了革命。1924年张若名的身份完全暴露,遭到法国秘密警察的询问和跟踪调查,很难继续开展革命工作,加之周恩来奉调回国等组织变故,在经过反复的思想斗争后,张若名决定脱离政治,在法国专心读书。1928年夏,从苏联途经法国回国的周恩来专程看望了张若名。张若名表示,自己虽离开了革命队伍,但决不出卖朋友和党的秘密,仍然愿意做一个不是共产党员的革命者,并表示要时时以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周恩来表示理解。^③1927年“4·12”事变后,国内的白色恐怖也蔓延到法国。在国民党右派的逼迫威胁下,杨堃接受了他的导师古恒代表大学校董会的劝告,也退出了共青团组织专心搞学术。时任共青团旅欧总支负责人的邓小平曾给他做工作,诚恳地劝他不要脱离革命。后来杨堃讲“我当时思想觉悟很低,不能领悟这些衷告的意义。……我再三考虑还是选择了后者。我向邓小平同志保证,退出共青团但绝不参加反革命组织。邓小平同志当即指出我所选择的这种第三条道路是行不通的。历史事实证明他是正确的,然而当时我却认识不到”。^④

之后,杨堃和张若名很好地实现了他们专心学术的愿望。在法期间二人先后完成了硕士和博士学业,1930年5月30日杨堃通过博士答辩,31日即与张若名在里昂中法大学礼堂举行了婚礼。同年12月15日张若名通过博士答辩,16日二人便携手踏上了归国的旅程,1931年1月4日回到北平。二人各有所工、各得其所,成为中国最早的一对博士夫妻。^⑤回国后也在各自的领域开辟了天地,在学术史上创造了杰出业绩。

看得出,五四运动和大革命时期,杨堃和张若名都有着一颗炽热的革命初心乃至共产主义信念。这颗初心不够坚固,在大革命的洪流中消退了,但并没有完全湮灭,而是隐伏在爱国的情感当中。杨堃讲,我虽然停止了政治活动,但始终思念祖国,“我十分清楚,作为一个民族学研究的学者,我的基础和服务对象只有一个,这便是我的祖国”。^⑥爱国主义离马克思主义并不远。所以在新中国的曙光刚刚显露的时候,他们的初心很快便被激活。1949年5月,杨堃加入了云南地下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者联盟”,并担任教授会的组长,团结师生进行了迎接云南解放和保卫昆明的斗争。新中国建立后他们一心跟共产党走,重新感到了革命斗争的乐趣和生活的意义。当然,这时的回归政治不再是示威游行、请愿宣传和流血牺牲,而是用自己的学术服务新中国的建设,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

1955年4月8日,周恩来赴印尼参加亚非会议途经昆明,利用这一机会到云南大学会见了杨堃和张若名夫妇。这次会见除了叙旧、转达邓颖超对张若名的问候之外,主要话题是和民族学问题有关。周恩来询问了杨堃国内外民族学的发展情况、外国的民族状况和云南的民族工作,也谈了大量自己的看法。其中包括,我们也要发展民族学,对资产阶级民族学要采取批判的态度,但批判也不能全部否定。学习苏联的民族学是好的,同样也不能生搬硬套。毛主席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方针政策和苏联不同,因为两国的具体情况不同。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

① 杨再道编著:《张若名研究资料》,中国妇女出版社1995年版,第78页。

②③ 尹家民:《周恩来、陈毅在昆明的日子》,《党史博览》2009年第8期。

④ 杨堃:《民族与民族学》,第395页。

⑤ 杨再道编著:《张若名研究资料》,第88页。

⑥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编:《中国社会科学家自述》,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461页。

马克思主义民族学也是要发展的。民族区域自治是毛主席对马列主义民族问题学说的一大发展。研究少数民族,一定要注意我国民族问题的特点,等等。谈话很深入,从早上8点持续到中午1点,共5个小时,还一同共进了午餐。^①

周恩来的会见和谈话给了杨堃极大的鼓舞和指导,也成为杨堃坚持民族学研究、弘扬和建设马克思主义民族学的一大动力,以至于后来他对马克思主义民族学研究的一些具体观点都和这次谈话有关。如他在《从摩尔根的〈古代社会〉到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谈到,“摩尔根是资产阶级民族学中最杰出的一位民族学家。《古代社会》是资产阶级民族学中最有价值的一部名著。……但摩尔根毕竟是一位自发的具有唯物主义思想的资产阶级民族学家。他甚至还是有神论者。如说他发现了人类原始社会的发展规律,那是不恰当的。发现原始社会发展规律的,是恩格斯,不是摩尔根。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仅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学的主要来源之一,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才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学的基本著作。从《古代社会》到《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是民族学史上一大革命。《古代社会》同《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关系,是和德国古典哲学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或英国古典经济学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关系一样,全是批判地继承”。^② 这都是周恩来在那次谈话中所提到的。另外周恩来也提到了拉法格(Paul Lafargue, 1842—1911)^③在马克思主义民族学上的贡献,也被杨堃在其后的著述中得到进一步阐述。

杨堃夫妇真诚地回归了政治初心。他们深刻反省早年退出革命的错误,努力学习和工作。云南刚一解放杨堃先生即写了入党申请书,不断用实际行动表达对党的忠诚。1984年,杨堃先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④ 当时他已83岁。从1950年提出申请到加入,经历了34年的考验。

在此,杨堃先生对马克思主义民族学的坚守从其坚韧的政治初心得到了另一层解答。杨堃先生的认识是:“总结一生中的经验教训,最深刻的一条,即社会科学是为政治服务的”,“想要研究马克思主义民族学,就要先使自己成为马克思主义者”。^⑤ 对于杨堃先生来说,马克思主义既是一种学术信仰,也是一种政治信仰,二者缺一不可。为达到这种圆满,他历经磨难,不懈奋斗。这种信念和精神连同他的学术著述一样珍贵,值得我们永远珍惜、继承。

〔责任编辑 刘海涛〕

① 杨堃:《回忆周总理关于民族学的一次谈话》,《社会科学战线》1978年第4期。

② 杨堃:《民族与民族学》,第388页。

③ 保尔·拉法格,法国工人党的奠基人之一,国际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和理论家,既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生和战友,也是马克思的女婿。

④ 杨堃:《杨堃自叙》,《史学理论研究》1998年第4期。

⑤ 杨堃:《民族与民族学》,第406页。